

纪念

← (上接 11 版)

们都迷失在“文革”的巨浪中,找不见对方了。到1968年底,全年同学作鸟兽散,他去了内蒙,我去了新疆。以后的十年间没有通过音讯。

再次联系时,已是1979年,我考上了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听说上一年赵昌平也报考了同一专业,因与第六名仅一分之差而未取。但第八名被调剂到社科院。所以他颇感不平,三次给我写信希望帮他了解原因。我听到传言,说他考得本来不错,但因为林庚先生说他在“文革”中拿走了自己的手稿,所以不

道昌平的北大情结是很深的。他曾和我说过,离校十年后重回北大考研究生时,他刚走到未名湖边,便泪流满面。无论我们在北大度过的五年留下了什么记忆,他对母校的怀念始终不变。

近 40年里,我和昌平兄因为地隔南北,平时没有交谈的机会。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见面,有事才书信往来。电邮流行以后,他一直不会用,我则懒于写信,通信就更稀了。但我家在上海,每年探望父母时,一定会到上古社去看望他,他有时也到我家来聊天。

的目录,为刊物提意见和建议。有时还有一些赠书。每年一次的聚会,不但加深了学者们对上古社的了解,文史哲不同专业的教授之间也得以相互熟识并有所交流。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难以忘怀的回忆了。

有机会见面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动态。30多年来,社会风云变幻,学风趋于浮躁,有时确能动摇人的心志。我们有一致的坚持和理念,彼此相互支持,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学术大道上有知交同路而行的愉悦和信心。而在昌平兄,和我聊天还有一层了解北方高校

起在上图为普通听众讲《古典诗歌的文化意蕴》,这是一场愉快的对话。直到我返京时,他仍然意犹未尽,在机场收到他好几封短信,反复和我商榷王维的“中岁颇好道”究竟指什么“道”。去年他已经从版协退休,却还为上海的文化传播工程《中华创世神话》写完了40万字的学术文本,以致病倒住院。今年2月,又帮助上海书画社的“中国书画文献基本丛书”寻找顾问。总之,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出版界的工作,只要有事找他,总会全力以赴。

昌 平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出版工作上,自己的学术研究则依靠下班回家以后到半夜这段时间。这种工作习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加上抽烟太多,很早就患有冠心病。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放松学术研究,无论是对于自己的方向还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趋势,都有很深入的思考,也常在不同场合发表。他主张宏观和微观研究的汇通,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寻文学现象更深层的内涵,一点点地从中抽绎出诗史发展的轨迹。他又特别重视对诗歌的感悟力,强调文学的内在规律研究,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这两点我深为赞同,也一直在与他遥相呼应。而他最独到的思考则是将文学史研究中的体悟和古典文论中的理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对古典文学研究本质的理论认识。尤其是关于《文赋》《文心雕龙》《诗式》理论体系的思考,几十年来未曾中断,想法也越来越清晰。他不但贯通了《文心雕龙》各章理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还将刘勰的理论体系活用到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之中。在2013年《文学遗产》编委会会议的笔谈中,他将文献、文化和文学之间三维一体的关系完全打通,透彻地解释了三者的定位和契合点,从根本上讲清楚为什么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意、言、象的道理,并进一步提出刘勰、皎然等人的理论体系实为“中古文章学”。由此分析了以文章为文学本位,必然对文化、文献学提出更高要求的原因。这就超出当前三者研究厚此薄彼、互相轻视的局限,可说是古典文学研究圈内少有的高姿态。他本人也运用这种思考,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来认识唐诗,提出过贯通“意兴、意脉、意象”的观点。六年前我在完

成《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一书后,请他在序中谈谈对这种实验性研究的看法,他又结合刘勰的理论,提出了“集意势声象于一体”的研究目标。像这样高屋建瓴的通透见解,在当今学界是极为罕见的。

昌平兄同时也用自己的唐诗研究实践了上述的理念。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多样,但能够全面掌握的学者并不多。昌平兄则既能做作家年谱考证、以及别集注释等文献整理工作,又能在作家思想艺术研究的基础上,对宏观的文学现象加以总结归纳,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问题。他曾告诉我,他的硕士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在答辩时曾经有争议,但马茂元先生极力称赞,并推荐他修改后寄到《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多少年后回过头来再看,这篇论文在当时确实开出了一种新路,即通过细读第一手文本,从中发现文献和前人研究中从未提及的文学现象。“吴中诗派”不是一个现成的文学史概念,是他首次提出的,这种深层次的问题隐藏在文本背后,需要研究者独特的敏悟才能发现。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种研究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境界。

此外,他在研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时,善于将诗歌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有机结合、相互渗透,由此开拓出多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例如《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是较早从某一地域的士风来考察某一时段诗歌态势的论文。当时几乎没有学者从北地豪侠型诗人群体这个角度,把崔颢、李颀和王昌龄这三位诗人联系起来认识。他从三者共同的行为和心理来解释其诗中的天真狂侠之气以及对七言诗的开拓,便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诗歌创作变化的内在机制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又如《开元十五年前后》是引用率极高的一篇名作,角度也很新颖。他因殷璠《河岳英灵集》中“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兼备矣”这句话,引起关于盛唐诗分期问题的思考,并运用考据式的做法,对开元十五年前后诗人群体的新陈代谢,著名诗人在长安登第的情况,社会状况和朝政的变化,诗人地位学问和风气与心态的转向,做了辩证的分析,由此指出盛唐诗人大致可分三期,当时存在朝野两种诗史的走向并相互影响,这是盛



2003年之后的十年间,作者(右)每年都能在全国“两会”上遇见赵昌平。每年他都会利用此进京机会在清华附近的餐馆召集座谈会,请学者们为《中华文史论丛》提意见和建议。此举不但加深了学者们对上古社的了解,文史哲不同专业的教授之间也得以相互熟识并有所交流。

取他。我不相信赵昌平会做这样的事,又无法求证,只好硬着头皮不回他的信。直到我留校后,有一次私下问林庚先生有没有这回事。林先生极为诧异,说:“我从来没见过赵昌平拿了我的手稿啊!他们那个班我只记得赵昌平一个人,所以我认得是他们班同学拿的,但不是赵昌平。”我如释重负,赶快把林先生的话转告昌平。同时又觉得非常憋屈,流言杀人,昌平真冤啊!

昌平兄1979年考上了华东师大施蛰存先生的研究生,到90年代时,已经成为颇有建树的唐诗研究学者。我曾向系里建议将昌平兄调进北大,金开诚先生也运用他的影响力到处帮我说话,教研室和系里已经表示了赞同的意向。可惜昌平兄后来自己犹豫了,我觉得他的根已经扎在上海拔不动了。不然北大就会多一位杰出的教授。虽然他在上海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知

本世纪初以来,我们又有一段时间都担任唐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和《文学遗产》的编委,见面的机会便有所增多。

2003年父母去世后,我回沪的次数减少。但此后的十年间,每年都能在全国“两会”上遇见昌平兄。2003年到2008年,我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北京团,他在第十届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别。2008年以后我转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教育界别,他也在政协,有时在同一所饭店驻会。加上他为《中华文史论丛》聘请了一批清华、北大的编委,有李学勤、李伯重、张国刚、陈来、阎步克、罗志田、秦晖、荣新江、陈平原、李零等等著名学者,我也忝为编委之一。每年他都会利用“两会”进京的机会,请国刚兄张罗,在清华附近的餐馆召集一次编委座谈会,和《论丛》的责任编辑一起,请大家看前几期和下期

学界信息,启发他策划出版选题的用意。谈得高兴时,就会笑着说:“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做出版。”我也觉得他对出版事业的投入是超过学术研究的。作为同行,我当然遗憾他为出版耽误了太多的研究时间,否则他的学术成果将会更加丰硕。但也许对他来说,学术成绩只是个人的事,出版却关乎社里的声誉和发展,“还有这么多人的饭碗”,后面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起。至于他个人在出版界获得的多种荣誉,他却从来不提,我还是从上古社的讣告里得知的。

近几年,昌平兄渐渐从总编的岗位上退下来,但继续担任上海版协理事长。每逢上海举办夏季书市,他都会协助版协邀请各专业的学者来上海图书馆举办文化讲座。这些讲座极受市民的欢迎,经常是一票难求。2014年夏,他也邀请我赴沪,和他一